

龔自珍己亥雜詩注

劉逸生注

劉逸生注

龔自珍己亥雜詩注

中華書局

龔自珍己亥雜詩注

劉逸生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2³/₄ 印張·259千字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6,000 冊

統一書號: 10018·447 定價: 1.40 元

龔自珍和他的《己亥雜詩》

十九世紀上半紀，是中國歷史上的大轉折時期。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在這五十年間宣告它的最後結束。隨着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轉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從這上半紀的末葉開始的。

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開端的第一年。自此以後的一百多年間，中國出現了許多驚天動地的變化，階級與階級的，民族與民族的，中國與外國的矛盾和鬥爭，由潛伏到激發，由局部到全面，一幕又一幕地展開。把不同階級、不同地位、不同思想、不同信仰的人全都卷了進去。這一切，是到了以後才變得明顯的。而在它的醞釀時期，也就是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之前，儘管也有些人看出諸如鴉片輸入、白銀外流、農村貧困、農民起義對清王朝的威脅這一類問題，表示了隱憂，但是，大抵都把它作為個別的局部的現象來議論。至於整個封建王朝的上層，却正如龔自珍所尖銳指出的：

秋氣不驚堂內燕，夕陽還戀路旁鴉。

——《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

他們正象是躲在華堂深幕中的燕子，儘管外面已經充滿肅殺的「秋氣」，可是在這些「堂內燕」看來，似乎仍舊是一派溫煦的春光。他們對即將來臨的暴風驟雨一無所覺，仍舊以為「天朝」的繁華興旺是可

以永久的，即便有些小小麻煩，也不足爲慮。因而他們照樣歡歌漫舞，花天酒地，同時絲毫也不肯放鬆對勞動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壓迫剝削。

在「世運」正在開始「潛移」之際，也曾有人能够站在思想家的高度，有力地指出清王朝眼前的處境不是什麼「盛世」，而是「衰世」，并且大膽地提出「一祖之法無不敝」，主張必須「豫師來姓」（預先汲取新興王朝的長處），不要等待別人來取而代之。這在當時的確是非常大膽、言人所不敢言的議論。作出這種議論的人，是一個地主階級的進步思想家兼文學家，也是近代我國維新思想的先驅者，此人就是站在我國近代思想史的大門口的龔自珍。列寧在《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一文中曾經指出：「剝削的存在，永遠會在被剝削者本身和個別『知識分子』代表中間產生一些與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龔自珍正是這一類的代表人物。

龔自珍，浙江仁和人（今杭州）人，字璣人，號定盦，又名鞏祚。生於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九二年），卒於道光二十一年（公元一八四一年），得年五十歲。

龔自珍生長在經濟號稱繁庶，文化也較爲發達的東南地區，門第又可稱得上書香世族。祖和父輩除了任官，還有著述，外祖父段玉裁更是著名的古文字學家，父親麗正有史學著作，母親段馴也是詩人。龔自珍從小就受到嚴格的封建文化傳統的教育，對經學、史學、古典文學、諸子百家，或深入研究，或廣泛涉獵，早年就打下相當紮實的學問基礎。其時正當乾嘉考據之學盛行，龔自珍的師友輩中，不少又是

考據學者，加上祖父輩的薰染，所以龔自珍自幼便養成考據的癖好，懂得如何「以字說經，以經說字」。他十二歲開始習誦《說文解字》，十四歲考訂古今官制，十六歲讀《四庫全書總目》，開始蒐羅罕見古籍，致力於目錄學，十七歲進一步收集石刻，研究金石文字，進行古文字學的研究。凡此，都說明他自小深受乾嘉樸學的影響。假如不是「世變劇烈」，迫使他走上另一條道路，他大有可能沿着閻若璩、戴震、王念孫、段玉裁等人開闢的路子走下去，成為著名的考據學者的（清《皇朝經世文編》《經解續編》均收龔自珍的《大誓答問》；光緒重修《杭州府志·人物志》列龔自珍於「儒學」，可見當時一些人的看法）。但客觀現實的嚴峻性卻不斷地衝擊龔自珍的頭腦。他看到鴉片煙的災禍正在愈演愈烈，因鴉片入侵而引起的白銀外流、農村破產、吏治加劇腐敗、農民起義此伏彼起，以及東南沿海敵艦環伺，西北邊疆形勢岌岌……這一系列驚心怵目的事實，不能不使他深深覺得：人們竭力吹噓的「天朝盛世」，確實已經一去不返了。

他以驚人的洞察力，透過現象看到事物的本質。指出：「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而實則是「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闔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而且，偶然有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其結果自然是由「衰」到「亂」——「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均見《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由於人才受到束縛和殺戮，於是朝廷與山野出現了相互轉化，美好的東西不再出現於「京師」而轉入「山中」。龔氏在《尊隱》一文中隱隱約約指出：「古先冊書，聖智心肝，不留京師，蒸嘗之宗之子孫，見

聞嬀姁，則京師賤；賤，則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矣。如是則豪傑輕量京師，輕量京師，則山中之勢重矣。如是則京師如鼠壤，如鼠壤，則山中之壁壘堅矣。京師之日苦短，山中之日長矣。……「龔氏甚至預見了清王朝被推翻的可能性：「夜之漫漫，鷓旦不鳴，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爲之鐘鼓，神人爲之波濤矣。」

龔氏又從幾個方面揭發清王朝制度的不合理。

其一曰：學與治分離。「後之爲師儒不然。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耒鋤，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資，士無報國之日。」（均見《乙丙之際箸議第六》）

其二曰：以資格抑制人才。「凡滿洲、漢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極速亦三十年，賢智者終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馴而到。此今日用人論資格之大略也。夫自三十進身，以至於爲宰輔，爲一品大臣，……然而因閱歷而審顧，因審顧而退憊，因退憊而尸玩，仕久而戀其籍，年高而顧其子孫，儼然終日，不肯自請去。或有故而去矣，而英奇未盡之士，亦卒不得起而相代。……一限以資格，此士大夫之所以盡奄然而無有生氣者也。」（見《明良論三》）

其三曰：一人專斷，臣僚無權。「朝廷一二品之大臣，朝見而免冠，夕見而免冠，議處、察議之諭不絕于邸抄，部臣工於綜核，吏部之議羣臣，都察院之議吏部也，靡月不有。府州縣官，左顧則爵俸至，右

顧則降級至，左右顧則革職至。……夫聚大臣羣臣而爲吏，又使吏得以操切大臣羣臣，雖聖如仲尼，才如管夷吾，直如史魚，忠如諸葛亮，猶不能以一日善其所爲，而況以本無性情本無學術之儕輩耶？（見《明良論四》）

其四曰：士大夫之無耻，其原因則爲「一人爲剛」。龔氏指出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爲剛，萬夫爲柔，以大便其有力強武。……大都積百年之力，以震蕩摧鋤天下之廉耻。既殄，既徬，既夷，顧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於臣，不亦暮乎！」（見《古史鉤沉論一》）

此外，龔氏還論述科舉考試制度的不合理，西域形勢之可慮，番舶入侵之頻繁，以及「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的危險情勢。（見《西域置行省議》）

以上幾個方面，可說都觸及清王朝政治上的痛處或社會上的隱患。因而龔自珍便發出「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的主張。他希望清王朝統治者「奮之！將敗則豫師來姓，又將敗則豫師來姓。」（見《乙丙之際箸議第七》）

他爲清王朝開出了一系列的「醫國之方」，如申張士氣（見《乙丙之際箸議第二十五》），保持天下之士之耻（見《古史鉤沉論一》），破格錄用人才（見《明良論三》），使臣僚有職有權（見《明良論四》），主張以「諷書射策」的辦法選用人才（見《述思古子議》）等等。此外，龔自珍又進一步指出平均財富的重要

性，他特地寫了一篇《平均篇》以申明此義。開宗明義就說：

「有天下者，莫高於平均之尚也，其遂初乎！」他指出「浮（與）不足之數相去愈遠，則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券矣。」他大聲疾呼，揭示不平等的災禍：

「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

平之道，龔氏認為：

「此貴乎操其本源，與隨其時而劑調之。」

——均見《平均篇》

我們可以看出，龔自珍這些筆鋒犀利，墨光四射的政治論文，深刻揭出清王朝的病癰，是言人所不敢言的。這就使不少頭腦還比較清醒的士大夫知識分子受到激勵，深感震動，不能不潛心思索國家社會的去向。清代士大夫知識分子議論時政的「一代風氣」，正是從這裏開端的。

乾嘉之際出現的公羊學派，原不過是清代經學一個分支，其初還只是純學術性，並不含有變革現實的政治內容，從孔廣森到劉逢祿都是如此。可是被稱為「東南絕學在毘陵」的清代公羊經學，到了龔自珍手中，就從本質上發生了變化。龔自珍曾經說：

昨日相逢劉禮部，高言大句快無加。

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

——《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十四首之六

他是受到劉逢祿的一定影響的，可是龔自珍却比這些公羊經學的老前輩想得更遠也更多，立場也和他們大不相同。因為龔氏認為，重新發掘評價的公羊經學，不應該爲了復古（主要的不是爲了恢復漢儒之舊），而應該是服務於當前的政治需要，復公羊古義的目的在於革新政治。這就不僅與蟲魚瑣屑的漢學家截然不同，便是與純學術研究的公羊經學也大異其趣。

我們可以這樣說：利用西漢今文學家提倡的「微言大義」，通過公羊經學「托古改制」的手段，使自己的變革主張獲得順利推進，換言之，將經學化爲維新變法的政治工具，這是清代公羊經學研究的一個飛躍，一種質變。它開創於龔自珍而大大發揚於康有爲等人。這是龔自珍對清代經學的一大貢獻。

不過，龔自珍在仕途上是很不得意的。由此終於阻塞了他親手施行改革政治的宏願。

龔自珍於嘉慶十五年庚午（公元一八一〇年）首次應順天鄉試，考中副榜第二十八名，那時只有十九歲。但在龔自珍自己看來，還是很不如意的。因為鄉試的副榜貢生，在一般人心目中還不是正式舉人，比秀才高不了多少。龔自珍不滿意這個「出身」，因此他在嘉慶十八年癸酉（公元一八一三年）和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公元一八一六年）兩次再應鄉試，希望取得正式舉人的資格，可惜都落了第。直到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公元一八一八年），第四次應鄉試，即清嘉慶帝六旬萬壽恩科，他終於中式第四名舉人。那時不過是二十七歲。第四名舉人是所謂「五經魁」之一，這使龔自珍大受鼓舞，以爲科名從此一帆風順，可望置身於卿相之列，實現改革政治的理想了。

不料事與願違，龔自珍再考進士試，却連連落第。嘉慶二十四年己卯是恩科會試，不第；嘉慶二十五年庚辰是會試正科，仍不第，只好出任一名內閣中書的微官。道光二年壬午是道光皇帝登極恩科，會試仍未第。這樣一直到道光九年，龔自珍已經三十八歲了，這年是第六次會試，才勉強中了第九十五名，殿試爲三甲第十九名，連一個翰林院也考不上，只好仍舊回到內閣中書的老位子上。

我們知道，科舉出身的高下，在那時是極關重要的。龔氏既無法「擢取巍科」，此後就始終被棄置在中書、主事的冷署閒曹之中，無從施展抱負。十年之後，終於迫得他不能不辭官而去。這就是龔自珍在官場上坎坷的一生。

龔自珍早年放言高論，詞鋒稜厲，一方面固然使他獲得許多人的注意，但同時也因此受到官僚大地主和他們豢養的「貌儒」之流的敵視和打擊。道光元年，也就是他出仕中書的第二年，他打算另找一條進身之階，應考軍機章京（清政府軍機處的屬員），就受到某權貴者的阻撓，使他落選。（龔自珍《小游仙詞十五首》的第十四首，有「吐火吞刀訣果真，雲中不見幻師身」句，就是暗述此事。）次年，某權貴又使用流言飛語的陰險手段，對龔自珍進行陷害。龔氏在《十月廿夜大風不寐起而書懷》詩中，曾這樣寫道：

貴人一夕下飛語，絕似風伯驕無垠。平生進退兩顛簸，詰屈內訟知緣因。側身天地本孤絕，矧乃氣悍心肝淳，欹斜譴浪震四坐，卽此難免群公瞋。名高謗作勿自例，願以自訟上慰平生親。……

到了棄官回鄉之時，他回顧過去官場中的經歷，又寫道：

猓獠猓獠厲牙齒，求覆我祖十世紀。

我請於帝詛於鬼，亞駝巫陽莅鷄豕。

這些都絕不是無根而發的。

政治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站在維護已得權益的立場上的官僚大地主們，是決不會容忍龔自珍肆無忌憚地對「現存制度」加以懷疑和進行攻擊的，至於任何的變法更新，他們更是視如大敵，非加以撲滅不可。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當時滿朝的王公大臣，除了少數個別的之外，都是龔自珍政治上的反對者，甚至是鎮壓者。

龔自珍的確抱着「死我信道篤，生我行神空。障海使西流，揮日還於東」的改革宏願，但是，也飽受種種挫折。正如他在詩中寫的：

危哉昔幾敗，萬仞墮無垠。不知有憂患，文字焚其身。

深重的創傷，使他覺得即使是用文字來表達思想，也遭到意外的不幸：

第一欲言者，古來難明言。姑將謫言之，未言聲又吞。不求鬼神諒，矧向生人道？東雲露一鱗，西雲露一爪，與其見鱗爪，何如鱗爪無！況凡所云云，又鱗爪之餘。

——均見《自春徂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

當然，龔自珍并不曾屈服，也并不絕望。他有兩句詩正好道出內心的自信：

五十年中言定驗，蒼茫六合此微官。

——《己亥雜詩》第七六

對於他自己寫的《東南罷番舶議》和《西域置行省議》固然有此自信，對於其他的改革主張，他又何嘗不有此自信呢！

龔自珍也免不了時代局限和思想局限。在龔自珍生活的年代，中國還沒有脫出古老的封建主義，甚至連「西方思想」介紹到中國來的也還很少很少，所以他的思想仍被桎梏在封建主義的範疇之中（例如他的《農宗》主張，就帶有濃重的封建復古色彩）。對於清王朝，他固然敢於大膽揭露其積弊，但又常常流露出「臣子的依戀」，所謂「終是落花心緒好，平生默感玉皇恩」（見《己亥雜詩》第三）所謂「棄婦丁寧囑小姑，姑恩莫負百年劬」（見《己亥雜詩》第十六）都是這種心情的反映。這也是一個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嚴重弱點。至於他有時還好談佛學，追求出世，雖然同他在政治上的失意有一定關係，仍不能不是暴露了作為一個地主階級革新者的軟弱和不徹底性。

龔自珍不僅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又是清代著名的詩人；而且「詩人龔自珍」的名氣也決不遜色於「思想家龔自珍」。一百多年來，龔自珍的詩同他的政論一樣，也產生過重大影響。晚清民初之際，學龔詩、集龔句的人之多，打開幾大冊《南社詩集》便可見一斑。南社詩人柳亞子推崇龔自珍的詩是「三

百年間第一流」，決不是過譽之詞。

可惜在龔自珍身後，著作嚴重佚失，而以詩爲尤甚。龔氏於己亥年（一八三九年）出都時，曾自稱「詩編年始嘉慶丙寅，終道光戊戌，勒成二十七卷」（見《己亥雜詩》第六五作者自注），那時還未包括《己亥雜詩》。但這二十七卷早已佚失，今除龔氏自定的《破戒草》、《破戒草之餘》外，都是後人陸續收拾的，全部合起來不過二百八十餘首。龔詩現存而最完整的，就是《己亥雜詩》了。

《己亥雜詩》是中國詩史上罕見的大型組詩，共有三百一十五首，都是七絕（有些是不那麼按照格律的古絕）。這一大型組詩寫於道光十九年己亥（公元一八三九年）龔氏辭官返家之時，由當年農曆四月二十三日開始寫起，至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止。龔自珍於庚子年（道光二十年）春給友人吳虹生的信中，提到這事：

弟去年出都日，忽破詩戒，每作詩一首，以逆旅鷄毛筆書於帳簿紙，投一破簾中。往返九千里，至臘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別墅，發簾數之，得紙團三百十五枚，蓋作詩三百十五首也。

——龔自珍全集·與吳虹生書（十二）▼

這一組詩，是龔自珍有意識地對前半生經歷作一小總結而寫的（當然其內容不限於總結過去）。其中不少篇章是自述家世出身，仕宦經歷，師友交游，生平著述的。這種自述性質的詩，可使後人更好地了解作者的生平爲人。但這僅僅是內容的一部分，《己亥雜詩》所涉及的遠不止此。

龔氏在寫給吳虹生信中的所謂「往返九千里」，大抵是這樣的：己亥年農曆四月二十三日出北京，

行前向一些老朋友告別，然後遵陸路南行。五月十二日抵達江蘇省清江浦，再南行至揚州，沿路會見一些友人，渡長江到鎮江，歷江陰、秀水、嘉興，於七月初九日抵達杭州。在杭州稍作停留，與舊友相見，大約八月底回到崑山縣的羽琰別墅。住到九月十五日再出發北上迎接妻兒。九月二十五日重到清江浦，十月初六日渡河北上，在山東曲阜稍作勾留，然後在河北省固安縣等候妻兒出都。十一月二十二日，與妻何韻雲及兒子昌匏、念匏女兒阿辛等南歸，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抵羽琰別墅。《己亥雜詩》就是在這大半年時間內寫成的。

龔自珍辭官出京之初，行色匆匆，不帶妻兒，不少人以為龔自珍在政治鬥爭中是徹底失敗，從此一蹶不振了。甚至連龔氏一些朋友也是這樣想。龔自珍是怎樣表示的呢？他一出都門，就朗聲吟出四句詩：

著書何似觀心賢，不奈卮言夜湧泉。

百卷書成南渡歲，先生續集再編年。

——《己亥雜詩》第一首

并不是停止鬥爭，宣告失敗，不過是換了一個地點罷了。今後還是照樣拿起筆桿，繼續寫我的戰鬥文章，決不歇手。

這就是開宗明義第一章，是一篇簡短而又明確的宣言書。

辭官歸去，別人以為他已成委地的落花。不妨也承認是落花吧；然而——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第五首

自己還是要培育新花的。而且——

先生宦後雄談減，悄向龍泉祝一回。

——第七首

不僅培育新花而已，還要重新亮出寶劍，進行新的戰鬥。

這是《己亥雜詩》的中心主幹，值得我們充分注意。

於是我們看見年近五十的龔自珍隨處都關注着國計民生：

滿擬新桑遍冀州，重來不見綠雲稠。

——第廿一首

他記起以前曾經向直隸布政使提議在河北大量種桑養蠶，而現在顯然未蒙採納。因為農村還是一片破敗景象。

五都黍尺無人校，搶攘塵間一飽難。

——第二十首

這是城市和墟鎮一片亂哄哄的情況。因為市集上竟連一把標準的官尺都找不到了。一路上，樹木稀疏，老百姓連一間像樣的房子都蓋不起，盡是破爛的窩棚、窯洞：

誰肯栽培木一章，黃泥亭子白茅堂。

——第廿四首

不論把守城門還是駐紮地方，軍隊總是紀律腐敗，訓練全無，只懂得向老百姓敲詐勒索。他感到這情況實在不妙：

椎埋三輔飽于鷹，薛下人家六萬增。

半與城門充校尉，誰將斜谷械陽陵？

——第廿五首

回到了號稱富庶的江南，那光景也大不如前了。沉重的賦稅，使農民大量破產，到處出現逃亡棄耕的現象。這使他禁不住大聲喊出：

國賦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勝栽禾！

——第一二三首

江南的水利，由於地主富農不斷侵佔土地而大受破壞。他打算再向當局提出治水的意見：

耻與蛟龍競升斗，一編聊獻郊僑書。

——第一四〇首

但最使龔氏驚心的却是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挾着砲艦推行其鴉片政策，在廣大城鄉已投下更深的陰影：官吏們許多都變成鴉片煙鬼，連勞動人民也大受毒害；鴉片的走私和賄賂，遍及沿海，使吏治